

中共對台戰略研究文獻： 成果、問題與探索

海軍中校 張蜀誠

提 要

國內外有關中共對台戰略研究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然而，學者通過不同研究途徑對中共對台決策影響因素與結果進行分析，往往提出分歧的觀點與意見。其中，國內藍、綠立場的不同，更造成對於中共敵友、是否合作等觀點的迥異與互斥。增益客觀理解北京對台政策實況的困難，學者們紛亂的研究意見，更讓讀者感到莫衷一是而不知所措。

本文旨在將中共對台戰略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歸納與分類，分析過去研究成果的貢獻，同時也整理出目前相關研究所遭遇的難題與爭論。接著，依據所整理的研究成果篩選出中共對台戰略的變數，並以此作為提出作者認為最周延與客觀的研究模式，俾利能站在過去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解決研究文獻所遭遇的困境。

關鍵字：中共、兩岸關係、戰略、研究

前 言

馬英九先生於2008年5月就職中華民國總統之後，中共隨即改變過去對台政策，大幅度的擴張與台灣各界的交往；雙方在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商下，達成涵蓋經貿、旅遊、航運、食品安全、司法互助與文化等方面交流協議。更有甚者，對於台北政府能與中國

大陸達成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願望，北京不僅處處曲意配合，中共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更在2010年春節前後，發表談話強調會照顧台灣農民。不難發現，過去中共高層領導人對於兩岸處於「高危期」的警告突然杳去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兩岸「和平發展」讓利之聲不絕於耳^①，不僅象徵著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更顯示中共對台政策有了新

註① 張五岳，「兩岸和平觀察系列—建構兩岸和平交流指標」，旺報，2010年5月20日，版12。



的轉變。

然而，進入嶄新階段的兩岸並未因此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特別在台灣社會內部，不同陣營的產、官、學與民意對於中共的對台政策存在不同的解讀與態度，且由於涉及到政治、經濟與社會利益與立場，致使不同觀點各自互不相讓，更多時候甚至互相掣肘，導致互相攻訐與內耗情形時有發生，不利於台灣建構起對中國政策的共識，遑論進一步在最大程度上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因此，如何從現行因政治立場而如瞎子摸象一般的以偏蓋全對中共的觀點，拼湊成完整客觀且能夠突破藍綠統獨框架的認知圖像，俾利作為策定未來我國大陸政策的基礎，便成為目前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政策研究者的最大挑戰。

中共對台戰略相關文獻探討

有關中共對台政治戰略的研究之繁多，用「汗牛充棟」形容毫不為過；不過，我們認為這些極具參考價值的研究與觀點如果以特定指標加以分類，將有助於讀者更能理解現存文獻的貢獻與所研究遭遇的困境。

一、研究途徑的整合

國內戰略專家李黎明主張，戰略可以從「力」、「空」與「時」三個變數加以分析，如此將更能看清楚戰略本質^②。李黎明的「力」、「空」、「時」不僅是戰略要素，也對應中國傳統的「天（時）」、「地（利）」與「人（和）」，三要素。因此，

我們決定聽從李黎明的建議，將前述三項變數作為文獻分類的指標，將有關中共對台戰略與兩岸關係相關研究文獻的成果現況、爭論甚至是未能解答的部分，予以整合、歸納（如表一所示），俾利讀者能夠有一目了然的完整認知。

從右表所歸納整理學者有關中共對台政策論述，可以清楚呈現以力量、空間及時間等不同的研究途徑；在力量研究途徑方面，我們以中共各代領導人為指標，可將研究文獻區分為毛澤東與第一代、鄧小平與第二代、江澤民與第三代、胡錦濤與第四代，以及各代綜述等四個類別；在空間研究途徑方面，可以看出研究者分別從國際、區域與兩岸等環境結構對於中共對台政策所造成的影響；至於時間研究途徑，則從過去、現在與未來作為分類標準。必須強調的是，上述作者們的不同研究途徑，絕非意味彼此論述範疇沒有互相重疊，之所以如此分類是由於他們研究主軸不同之故。更重要的是，這些學者提供許多可貴且深具參考價值的研究見解與觀點。有利於我們能夠從更寬廣與更高遠的角度，進行有關中共對台戰略的延伸性研究，並且逐步朝理論化目標邁進。不過，在吸收學者們研究成果同時，必須注意其研究上的限制與爭論之處，避免重蹈覆轍與浪費研究資源。因此，接下來，我們將針對有關文獻的貢獻與問題進行分析，俾利為尋求更加客觀且周延的研究途徑。

二、以力量為研究途徑

註② 李黎明，轉軌：變遷中的戰略思維（台北：時英出版社，2001年8月）。

表一 力空時指標下的中共對台政策文獻一覽表

指標	研究途徑		研 究 者
力量	毛澤東		李志綏、張戎與喬·哈利戴、李立、李瑗、辛子陵、周永章與徐學初
	鄧小平		鄭義、阮銘、任慧文、成龍
	江澤民		任慧文、阮銘、Robert Lawrence Kuhn、龍德
	胡錦濤		邵宗海、彭付芝、馬玲與李銘、Murray Scot Tanner
	四代領導人		謝雪屏、Susan Shirk、石之瑜（三代）、何頻（三代）
	決策 組織	文	郭瑞華、Richard C. Bush、李英明、Michael D. Swine
		軍	Cynthia A. Watson、david Shambaugh、Michael D. Swine、John W. Garver、鄭義
	決策 派系	文	吳玉山、林文程與江水平、阮銘、馬丁·拉薩斯特（Martin L. Lasater）
		軍文關係	Ellis Joffe、David Shambaugh
		軍	何頻、林宏展、Michael D. Swine（專業派系）、金千里
空間	國際結構		楊潔勉、高朗、林紅、宮力、宋淑玉、王瑋琦、Avery Goldstein
	亞太結構		楊永明、趙國材、蕭全政
	美、中、台結構		胡全威、許湘濤、William Tow、陸年安、張亞中與孫國祥、James Lilley、James H. Mann、宮崎正弘、William Triplett II & Edward、傅建中、Timperlake、吳玉山
	兩岸結構		黃瑤、楊開煌、傅岳邦、胡公展、
時間	過去	二階段	蔡政文與林嘉誠、趙全勝、施正鋒、邵宗海、童振源、楊開煌、陳力生、李英明、吳建德與翁明賢、林勁與聶學林
		三階段	李家泉、王崑義、蔡天新、謝雪屏、吳建德、馬英九、張亞中與李英明、Jing Huang、高曉林、胡永強與曹希苓
		四階段	何迪
	現在		李群英、劉國琛、何達需、沈言明、初國華、克禮、鄭海麟、胡公展、劉紅、王克群、吳宜、謝雪屏
	未來		劉強、劉國琛、張亞中、黃光國、趙全勝、龍德、石齊平、曹興誠

資料來源：由作者歸納整理。

在以「人」為研究重心方面，學者存在較大的共識，就是以中共四代領導人為研究標的，藉以分析不同世代、背景與成長環境下的領導人在對台戰略的思維與特色。由於中共政治制度採民主集中制，首長負責一切政策決定權。因此，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等中共第一至第四代領導人，不僅是中共政治權力集於一身者，同時也是

對台戰略的決策核心。因此，研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個性、決策習性與價值觀點，有助於理解中共對台政策的深層意義與背景。不過，這裡所指的，不僅是毛、鄧、江、胡，還包括其他各代領導集體成員在內。因為，在鄧小平以後，最高領導人的集體決策，在對台戰略中所佔比重越來越重要之故。值得注意的是，李志綏、阮銘^③、鄭義^④等學者

註③ 阮銘，透視總書記：江澤民文選導讀（台北：財訊出版社，1998年9月）；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頁60。

註④ 鄭義，鄧小平和他的對台策略（台北：開今文化出版社，1994年3月）。

由於過去曾擔任中共領導人的決策班子或顧問，或親身經歷決策事件，因此其著作深具參考價值。

除領導人之外，決策組織與中國的派系政治也是探討中共對台戰略所不能忽略的環節。郭瑞華^⑤與卜睿哲（Richard C. Bush）^⑥等學者從決策體系，探討中國對台政策^⑦。何頻、林文程等人則從江澤民時代解放軍派系與中共軍文關係，及其對台政策的影響進行耙梳^⑧。決策組織與派系研究途徑，可讓讀者藉此理解在中國特殊政治文化裡，組織與派系交錯與競合及其對台決策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軍方體（派）系，其在對台和戰決策中扮演著不可小覷的角色。對此，Ellis Joffe、David Shambaugh^⑩、Michael Swine^⑪與Martin L. Lasater^⑫的研究，可謂深具啟發性。

然而，「人」可說是最難做客觀研究

的，研究中共領導人尤其如此，由於對包括健康狀況在內嚴予保密，外界對於中共領導人的言行往往無法近距離的觀察。阮銘、李志綏等人儘管具有近距離觀察與體認的優勢，但往往難以摒除私人好惡愛恨，因此無法全然客觀進行分析與評價。處理日常事務的決策組織，究竟有多大決策影響力，同樣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至於派系研究，在中共嚴禁搞派系的情況下，更陷入派系與成員盤根錯節的混亂與缺乏根據的臆測。上述問題，在在凸顯以力（人）為研究途徑的困境。

三、以空間為研究途徑

喬治·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指出，地緣政治是一種思考世界的方式，用來預測事件過程會產生何種結局^⑬。顯示，環境往往扮演著經濟學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功能。許多探討中共對台政策學者，也從

註⑤ 郭瑞華編著，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印行，1996年12月）。

註⑥ Richard C. Bush、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5月）頁238-265。

註⑦ Richard C. Bush、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5月）頁238-265；郭瑞華編著，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印行，1996年12月）。

註⑧ 何頻，中國解放軍現役將領錄（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4月）頁1-31。

註⑨ Ellis Joffe, "The Military and China's New Politics: Trends and Counter-Trends," in James C. Mulvenon and Richard H.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RAND, 1999)pp.22-47.

註⑩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pp.11-55.

註⑪ Michael D. Sw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 RAND, 1996).

註⑫ Martin L. Lasater, Peter Kien-hong Yu, Kuang-ming Hsu, and Robyn Lym, eds., Taiwan's Security in the Post-Deng Xiaoping Era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p.66.

註⑬ George Friedman著、吳孟儒、林曉芳、黃思瑜、楊彞安譯，未來一百年大預測（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台北：木馬文化出版社，2009年7月）頁27-28。

環境的空間結構為研究途徑。這方面，在國際環境與結構方面，徐博東¹⁴、宮力¹⁵、楊潔勉與高朗分別從國際權力格局框架，分析北京所採取的對台策略¹⁶；在區域與兩岸環境與結構方面，楊永明從亞太安全環境，探究中共攻台政策所受到的影響¹⁷。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趙國材從美、日、印、台之間關係結構，與中國對外關係及其對台「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與對外「不干涉內政」要求的角力¹⁸。胡全威、許湘濤以及William T. Tow¹⁹與Susan Shirk²⁰則從美、中、台三方關係結構，探討中共對台政策²¹，以及中共軍

事嚇阻與國際「聯美制台」策略²²。楊開煌²³、傅岳邦、胡公展²⁴、李松林與楊建英²⁵則從兩岸結構與「一國兩制」角度，探討中共對台政策²⁶。

以國際、區域與兩岸空間結構作為研究途徑的貢獻，在於論證外在環境對於決策所形成決定性影響的重要性。因此，論及中共對台的戰略決策，環境因素將佔有十分醒目的地位。不過，誠如溫特等建構主義者的主張，決策單位與環境之間是呈現互動性的影響，而非被動性的接受。北京在對台政策方面，除了受到外在環境影響之外，隨著中國

註¹⁴ 徐博東，大國格局變動中的兩岸關係（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5月）。

註¹⁵ 宮力，「2008年中美關係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關係，2009年第3期，2009年3月頁10-12。

註¹⁶ 楊潔勉，世界格局中的台灣問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21期，2004年9月，頁19-48。

註¹⁷ 楊永明，「亞太安全環境對台灣安全的衝擊」，遠景季刊，第1卷，第3期，頁1-30。

註¹⁸ 趙國材，「『十七大』前後中共外交之總體形勢評估」，東亞研究，第38卷，第1期，2007年1月，頁217-226。

註¹⁹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225-277.

註²⁰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264-261.

註²¹ 胡全威，「胡錦濤的機遇與挑戰」，歷史月刊，2002年9月號，頁74-80；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225-277.

註²² 許湘濤，「二〇〇四年我國總統選舉與公民投票期間中共對台政策之研究」，國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第5期，頁447-503。

註²³ 楊開煌，「從政治定位看兩岸關係60年」，海峽評論，第227期，2009年11月1日，頁29-32。

註²⁴ 胡公展，「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和平統一」理論的創新」，中央社會主義學報，第6期，總第150期，2007年12月，頁70-74。

註²⁵ 李松林、楊建英，中國共產黨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及經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註²⁶ 傅岳邦，「中共對台政策的制度與策略：一九九七年台港海運談判中雙方船旗爭議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2001年11、12月，頁13-30。



綜合國力的增長，以及與外在環境之間的消長變化，都成為構成決策環境的一部分。中共軍事能力的增長，便改變國際環境與外在權力結構的客觀面貌，同時促成北京轉變其對台政策內涵的環境因素。這一點，很遺憾的，少有學者提及。

四、以時間為研究途徑

以時間作為研究途徑的文獻，可以再進一步劃分過去、現在與未來。

(一)過去式的研究途徑

以時間作為研究途徑者，可大致將中共對台政策區分為「二階段」論、「三階段」論與「四階段」論；所謂「二階段」是指「軍事鬥爭」與「和平統戰（一國兩制）」等兩個主要階段²⁷。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於1978年後強調「和平統一」，相對於此，之

前的中共對台政策自然著重於武力攻台。這方面，邵宗海提出「武裝解放時期開展到和平解放時期」作為第一階段²⁸；「三通四流，兩黨談判鼓吹時期」作為第二階段²⁹。童振源、楊開煌與陳力生儘管對政策階段劃分及其名稱有所不同，但其內涵與邵大同小異³⁰。

「三階段」論者則認為，「軍事是鬥爭」時期後，中共於1955年起進入以「和平對峙」為特色的第二階段，至於「和平統一」則是第三階段。王崑義、蔡天新與謝雪屏都認為，1955年以後兩岸進入「政治鬥爭為主、軍事鬥爭為輔」的階段，中共在此階段中調整對台政策，尋求和平解放的新途徑³¹；張亞中與李英明的三階段論點，則是在1979年前後作為第一、二階段的區分外，將

註²⁷ 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1989年）頁14-5；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微觀、宏觀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頁122；施正鋒，台中美三角關係：由新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年）頁84；李英明，中國大陸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頁166；翁明賢、吳建德主編，兩岸關係與信心建立措施（台北：華立出版社，2005年）頁47-70；張惠玲，「歐盟『共同安全暨外交政策』之整合談判過程與台海兩岸協商經驗之比較」（高雄：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6月）頁58；林勁、聶學林，「1949年以來金門在兩岸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台灣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總102期，頁23-32。

註²⁸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頁175-240。

註²⁹ 請參閱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頁175-240。

註³⁰ 童振源，「中國對台政策：演變、特徵與變數」，收錄於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出版社，2002年）頁312-3；楊開煌，出手：胡政權對台政策初探（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60-1；陳力生，台灣海峽的和平與戰爭（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年）頁123-34。

註³¹ 王崑義，「兩岸和平協議：理論、問題與思考」，全球政治評論，第26期，2009年，頁60-61；蔡天新，「建國以來大陸對台政策的歷史演變與兩岸關係發展」，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3期，2009年9月，頁1-7；謝雪屏，「『一個中國』原則—中共歷代領導人對台政策上一脈相承的原則立場及啟迪」，洛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2009年8月，頁33。

1987年兩岸開展民間往來後至今作為第三階段³²。李家泉則認為，中國大陸對台政策歷經三個轉變，第一次是在1955年從過去武力解放轉變為和平解放；第二次在1979年從和平解放轉變為和平統一；第三次則是在2008年由長期僵持轉變為暫擱爭議³³。

此外，何迪指出兩岸關係可劃分四個階段，依序為³⁴：(一)零星軍事對抗階段（1949-1958）；(二)冷戰式對抗階段（1958-1979）；(三)相對和平共處與交流階段（1979-1994）；以及(四)零星對抗與經濟往來熱絡階段（1994-）。上述兩岸關係的階段劃分，也顯示中共在各階段中對台戰略的主要特色，有助於讀者藉此達鑒往知來之效。

(二)現在式的研究途徑

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後，由於大陸政策由過去「一邊一國」轉為支持「九二共識」，開啟兩岸關係發展新紀元，並且成為兩岸學者探討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政策的熱門議題。李群英將現階段兩岸關係定義為「和平發展」階段³⁵；劉國琛透過兩岸和平發展的內涵、框架，作為分析大陸兩岸和平發展政策的基礎與重點³⁶；何達需、沈言明從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兩岸關係，中共的對台政策回應與所遭遇的困境進行剖析³⁷；余克禮、鄭海麟與劉紅從「胡六點」解讀大陸對台「和平發展」政策，同時分析胡錦濤政策創新的內容項目與意義³⁸。彭付芝從「以人為本」執政核心措施，探究胡錦濤有關和平統一論述意涵³⁹。此外，謝雪屏也從歷代

註³² 張亞中、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台北：生智出版社，2001年2月）頁207-233。

註³³ 李家泉，「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兩岸關係」，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第6卷，第4期，總22期，2008年12月，頁37-38。

註³⁴ He Di, "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 The CCP's Unrealized 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York: M.E. Sharpe, 2003)p.73.

註³⁵ 李群英，「六十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幾點思考和建議」，海峽評論，第227期，2009年11月1日，頁33。

註³⁶ 劉國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課題淺析」，台灣研究集刊，總102期，2008年，第4期，頁1-6。

註³⁷ 何達需，「試論國民黨重新執政下的兩岸關係」，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2009年3月，頁44-46；沈言明，「論馬英九執政後的兩岸關係」，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2009年5月，頁22-23。

註³⁸ 余克禮，「『六點意見』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戰略方針」，兩岸關係，2009年第1期，2009年1月，頁15-16；鄭海麟，「胡錦濤兩岸和平發展72字方針」，海峽評論，第218期，2009年2月，頁46-47；胡公展，「論黨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對『和平統一』理論的創新」，探索，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頁8-11、22；劉紅，「實現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光輝文獻——學習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7卷，第1期，總23期，2009年2月，頁56-62。

中共領導人的對台政策基本思路，探究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延續性⁴⁰。

不難發現，針對中共對台戰略現階段進行分析者，大多是中國大陸的研究者。這種情況顯示，大陸對現階段兩岸關係的重視。台灣方面，則大多見於報刊短篇意見，相較之下較為零散，也通常僅止於對中共政策的詮釋。不過，現階段的研究，提供讀者有關國民黨重新執政後至今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框架意涵與發展，俾利與過去對台政策進行比較對照，獲得對中共對台決策內涵更深的理解。

(三)未來式的研究途徑

如何從過去政策路徑與得失檢討，預測未來發展方向，或是尋求未來解決困境的關鍵。不僅是社會未來學的探討重點，同時也在中共對台政策方面佔有一席之地。劉強從台灣民眾的對台灣人身分的認同感對中共統一所造成的阻礙，分析中共對台政策未來應發展方向⁴¹；同時，為了解決兩岸政治分歧與對立，劉國琛提出「球體國家論」⁴²，作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的政治基礎，以及台

海雙方政治共存方案⁴³。張亞中、黃光國與曹興誠等台灣產學界專家，則提出「一中三憲」或「兩岸和處法」等主張，試圖為現階段「一中各表」在未來兩岸關係所遭遇的困境解套，其中也涉及對中共未來對台戰略的建議。

以時間與階段作為研究途徑的貢獻，在於突顯出中國各個時期對台的主要作為，也說明了中國在不同對台政策思維下的實際行為。讀者可從上述學者的研究，獲得有關中共對台戰略完整發展與變遷脈絡，達到對於政策擁有完整的圖像知識，並且能夠進一步歸納出各時期政策內涵的常與變，也就是延續與變遷。不過，誠如上述「二階段」與「三階段」與「四階段」論所顯示，學者對於中共對台政策的階段劃分，存在明顯的分歧與爭論。再者，對於「軍事鬥爭」與「和平統戰」作為劃分指標，也不是沒有問題。從中共和、戰兩手並進策略可知，以「軍事鬥爭」或「和平統一」為劃分方式，往往容易造成以偏蓋全式的誤導⁴⁴。顯然，以和平、戰爭作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劃分方式進行

註³⁹ 彭付芝，「論胡錦濤同志關於祖國和平統一主張中的以人為本思想」，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總160期，2009年8月，頁68-72。

註⁴⁰ 謝雪屏，「試析中共歷代領導人對台政策的基本思路」，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2008年8月，頁20-24。

註⁴¹ 劉強，「兩岸互動與國家認同—基於台灣民眾的分析視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4期（總第160期），2009年8月，頁59-63。

註⁴² 所謂球體國家論，就是指中國這一國家球體表面是紅、藍雙色構成的，因為中國境內存在兩個互相競爭的政權，各自在不同的空間代表這個球體，雙方形成事實上的一體兩面的關係。

註⁴³ 劉國琛，「兩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灣研究集刊，1999年，第1期，頁14-22。

註⁴⁴ 丁樹範，「兩岸和平觀察系列 如何觀察兩岸和平狀態」，旺報，2010年5月13日，版12。

分析，顯然未盡妥善。更有甚者，對於中共60年來對台政策各階段的改變，至今沒有學者提出具體指標，作為解釋與預測的變數，使得以時間為研究途徑，形成破碎而缺乏一致性的政策說明，僅能應付一時，卻不利於建構此方面整體而長時期的理論。

總而言之，有關中共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方面的文獻，無論在力、空、時方面的研究途徑皆有其研究貢獻之處，也存在過於單向、片面甚至爭論不休的問題。此外，也少有學者能夠周延說明中共對台政策的變化動因；更有甚者，至今未見任何學者專家針對中共長達60年的對台政策，如何建構起固定不變且前後一貫的模式，亦能解釋過去、說明現在與預測未來中共對台戰略，不僅是研究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政策的嚴峻挑戰，同時也是本文企圖解決的研究問題。

研究途徑探索

要確立能夠解決前面所提問題的研究途徑，我們認為首先要選擇適合的理論作為分析基礎；接著，必須尋求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變數作為分析的支柱。最後將兩者予以整

合並賦予邏輯性的關係，方能建構出客觀周延研究模式與分析架構。

一、理論選取

大西洋月刊主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感嘆，在西方事務方面，存在理論過多，但事實不足的現象；但這一點在東亞研究方面剛好相反，世界充斥著有關亞洲政經各種資訊，但卻缺乏適用的理論作為工具，整理出個所以然來⁴⁵。上述現象也存在於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目前這方面研究主要有兩種途徑；其一是描述性的，另一種則是套用理論與模型⁴⁶。由於缺乏理論基礎，同時為建構起與西方相容的共通性觀念，研究中國事務者不得不採取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⁴⁷。在這方面，學者均進行許多有益的嘗試；例如傅岳邦從制度理論，對中共「一個中國」政策進行探討⁴⁸；任克敏從統合理論為角度，分析中共「一國兩制」政策⁴⁹；湯紹成則從國際關係理論的途徑，審視中共對台政策，並且主張中共對台政策已從過去現實主義的政策內涵，轉向具建構主義性質的作法⁵⁰。張程則從建構主義分析中共對台建立文化認同的政

註⁴⁵ James Fallows著、薛絢譯，瞄準大東亞（The Rise of the New East Asi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台北：立緒出版社，1996年2月）頁1。

註⁴⁶ 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1995年4月）頁7。

註⁴⁷ 石之瑜，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出版社，1995年3月）頁3-4。

註⁴⁸ 傅岳邦，「中共對台政策的制度與策略：一九九七年台港海運談判中雙方船旗爭議之個案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2001年11、12月，頁13-30。

註⁴⁹ 任克敏，中國大陸經改理論與兩岸關係（台北：高立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9月）頁303-372。

註⁵⁰ 湯紹成，「中共對台政策新紀元」，海峽評論，2009年2月，頁40-41。

策⁵¹。

儘管不同理論作為分析中共對台政策的基礎，有其研究多元的價值，但上述理論皆源於西方國家，特別是曾經被中共貼上「帝國主義」標籤的理論，其所依據的是西方人的思維模式，而非中國人的⁵²，因此這些理論在中國方面的演繹效度與信度，有越來越多學者提出質疑⁵³。由於很難從現存（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獲得兩岸關係滿意的解釋或預測⁵⁴，因此學者儘管多方試圖將西方現有的理論成果進行「中國化」，但至今仍然不得要領。石之瑜強調要從中國本身作為研究出發點，先不管這樣做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普遍化的要求。在這方面，他主張以「神入法」作為研究中國的方法⁵⁵。然他所主張分別從決策者心理、中國文化、政治制度、意識型態等多方面「神入」，若不是不可能的話，也屬極端困難。同時，這樣的看法忽略

過多變數儘管更接近客觀狀況，但過多變數反而不利理論的建構。

必須指出，將西方理念中國化的不僅是學者，也是中共各代領導人的任務核心。最成功的案例，也影響最深遠者，當屬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工程⁵⁶。我們認為，這不僅是中共因「堅持馬列主義」政治考量的口號，更是北京政策的實際內涵。儘管意識型態對政治的影響力，自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後急遽下降，但許多證據仍顯示在決策思維方面，辯證法仍然主導著北京領導集體。可以看見，毛澤東的許多著作與談話，充斥著辯證性的思維；鄧小平、江澤民乃至現今中共第四代領導核心的胡錦濤，也並不例外。平可夫便認為應該從馬克思辯證法中發展與變化的角度，分析中共的對台用兵策略⁵⁷。許立坤從中共「統一戰線（簡稱「統戰」）」思想，探討胡錦濤的對台工作理論

註⁵¹ 徐宇春、張程，「從建構主義視角看兩岸關係」，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9年第11卷第1期，2009年1月，頁37-40。

註⁵² John & Doris Naisbitt著、侯秀琴譯，中國大趨勢（China's Megatrends: The 8 Pillars of a New Society）（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10月）頁26、40-41。

註⁵³ 有關這方面看法，可以參閱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著、李隆生、張逸安譯，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台北：聯經出版社，2010年4月）頁476-477；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著、杜默譯，不可思議的年代一面對新世界必須具備的關鍵概念（The Age of Unthinkable）（台北：行人出版社，2009年10月）頁200-205。

註⁵⁴ 曾錦城，下一場戰爭？中共國防現代化與軍事威脅（台北：時英出版社，1999年7月）頁36。

註⁵⁵ 石之瑜，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台北：三民書局出版社，1995年3月）頁7。

註⁵⁶ 陳子明、王軍濤，解除中國危機：關於中國政經環境的祕密報告（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6月）頁34-41。

註⁵⁷ 平可夫，僵局：兩岸情事（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5年8月）頁3-6。

的新貢獻⁵⁸。所謂「統戰」，就是辯證法在敵、我對立關係的辯證性策略運用。王功安、張同新等學者也認為，胡錦濤自2005年3月4日提出「四點意見」以來，不斷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統一理論向前推進⁵⁹。此外，胡錦濤所主導的「統籌」政策，也不脫中共政策的辯證性思維。

在學術研究方面，誠如鄒讜所指出，馬克思著作所包含分析歷史、經濟與政治的觀點和方法，實際上已為許多社會科學家所接受，不過，他們不說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已⁶⁰。中共許多對台政策，都可以從馬列主義與辯證法當中尋求答案。例如，中共提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許多台灣學者與媒體認為，這是北京對台的政治框架策略。但事實上，和平發展並非只是政治範疇的架構，而涵蓋了經貿與文化等社會範疇。這一點，誠如恩格斯所指出，「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

的經濟學去尋找⁶¹。」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是世界潮流主題，也將政治經濟的辯證性關係，作為對國際局勢觀察的總結。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即以人為本，是中共根據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主體，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力量的基礎原理提出來的⁶²。對此，彭付芝認為，中共推進祖國統一大業，要靠兩岸同胞共同努力與開創，體現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其中，「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則屬於北京體現一切為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唯物史觀範疇⁶³。

因此，基於貼近中共領導決策的思維模式，達到石之瑜所謂「神入」的中國研究境界。本文以馬列主義的核心，亦即辯證法作為分析的基礎，並運用在中共對台戰略的模式上。如此，不僅有助於說明儘管中共歷經四代政治領導者，但在戰略或政策上，仍然具備某種程度的一貫性；同時也有利於建構起中共長達60年對台政策的常規性指標，既

註⁵⁸ 許立坤，「胡錦濤對台港澳僑工作理論政策的新貢獻」－胡錦濤統一戰線思想研究系列之五，學術論壇，2008年，第10期，總213期，頁13-16。

註⁵⁹ 范前鋒，「兩岸關係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觀點綜述」，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6期，2008年12月，頁95。

註⁶⁰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37-38。

註⁶¹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收錄於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307。

註⁶²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寫組，科學發展觀學習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06年）頁18。

註⁶³ 彭付芝，「論胡錦濤同志關於祖國和平統一主張中的以人為本思想」，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總160期，2009年8月，頁68-72。

能進行實證性的檢驗，也能達到華爾茨對理論建構的精簡指標要求。

二、變數選取與關係定位

選取影響中共對台戰略決策的變數，絕非是一件簡單的事。幸好，學者們大量的分析與歸納，提供我們得以從中汲取成果，並透過接下來實證性研究進行驗證與修改的機會。不過，在採用學者先前的研究觀點與成果之前，批判性的繼承不僅符合馬列理論的要求，也是建立變數間邏輯性關係的必要篩選。

(一)歸納變數

事實上，學者們在論及中共對台策略時，便針對影響中共決策的變數提出自己的意見。其中，大陸學者方面有謝雪屏⁶⁴；台灣方面則有陳毓鈞⁶⁵、陳水扁、呂秀蓮、高朗⁶⁶與林中斌等人；至於外國學者方面較著名的有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L.Shirk）、國防部亞太副助理部長薛邁龍（Michael Schiffer）⁶⁷與卜睿哲⁶⁸等學術與實務兼備的兩岸事務專家。上述學者與兩岸實務工作者的看法，可以歸納如下表所示：

從下表中共對台戰略內容，也呈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中共的政策重點放在促統時，便反對國際社會的介入；一旦以反獨為重點時，便希望國際社會的介入與對台灣獨立的牽制。再者，無論促統或是反獨，和平與戰爭兩個方式都是確保統一目標達成不可或缺的手段，形成前國安會諮詢委員蘇進強所形容的，全世界也僅台海兩岸有「一邊經貿往來，一邊武力威脅」的荒謬現象⁶⁹。同樣重要的是，儘管根據王瑋琦的研究顯示，中共自1995年起由「兩個寄希望」，意即同時「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與台灣當局，轉而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意味著中共放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然而，從前面學者及具實務工作經驗的專家的意見可以看到，無論促統或是反獨，北京從未真正放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因為除非以極端摧毀台灣為目的的武力打擊（這樣的機率微乎其微），否則台北行政當局是無法迴避的，就算是武裝衝突，仍需要和談的行政法人。在這方面，政治觀察家王銘義認為中共對台有三道戰爭防線；第一道是台灣人民；第二道是在野黨的態度；第三道則是國際強權的

註⁶⁴ 謝雪屏，「試析中共歷代領導人對台政策的基本思路」，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2008年8月，頁20-24。

註⁶⁵ 陳毓鈞，胡錦濤時代的美中台動向：維持現狀、遏制台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年8月）頁11-12。

註⁶⁶ 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21期，2004年9月，頁37。

註⁶⁷ 劉屏，「美官員：共軍已能進犯金馬」，中國時報，2010年3月20日，版4。

註⁶⁸ Richard C. Bush、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5月）。

註⁶⁹ 蘇進強，「簽ECFA與撤飛彈是兩回事」，中國時報，2010年5月19日，版15。

表二 專家學者有關中共對台政策變數觀點一覽表

專家學者	政策重點		手段		國際環境		台灣情況	
	促統	反獨	和	戰	介入	不介入	政府	人民
謝雪屏	◎		◎	◎		◎	◎	◎
高朗		◎	◎	◎	◎		◎	◎
李成	◎		◎	◎		◎		◎
陳水扁		◎	◎	◎	◎		◎	◎
薛邁龍	◎		◎			◎	◎	◎
王銘義		◎			◎		◎	◎
李松林 楊建英		◎	◎	◎	◎		◎	◎
孫建中	◎		◎	◎		◎	◎	◎
卜睿哲		◎	◎	◎	◎		◎	◎
William Tow		◎	◎	◎	◎		◎	◎
Susan Shirk		◎	◎	◎	◎		◎	◎
陸年安	◎		◎	◎		◎	◎	◎
林中斌		◎	◎	◎	◎		◎	◎
平可夫	◎		◎	◎		◎	◎	◎

資料來源：李松林、楊建英，中國共產黨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及經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孫建中，「2008年台海安全情勢分析」，收錄在王緝思主編，中國國際戰略評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5月）頁50-51；陸年安，新世紀美中台戰略關係互動（台北：超美印刷，2003年9月）；林中斌，以智取勝（台北：全球防衛雜誌社，2005年1月）頁431-436；平可夫，僵局：兩岸情事（台北：新新聞出版社，1995年8月）；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225-277;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p.264-261. 謝雪屏，「試析中共歷代領導人對台政策的基本思路」，湖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2008年8月，頁20-24；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第21期，2004年9月，頁37；「中國人自選國家主席『再等一、兩代』」，聯合報，2010年4月8日，版12；劉屏，「美官員：共軍已能進犯金馬」，中國時報，2010年3月20日，版4；呂開瑞，「呂秀蓮談ECFA『經濟在前、政治在後』」，聯合報，2010年5月16日，版5；王銘義，「三道防線失其二，中美防失控」，中國時報，2007年7月26日，版2；Richard C. Bush、林添貴譯，台灣的未來：如何解開兩岸的爭端（台北：遠流出版社，2010年5月）頁238-265；郭瑞華編著，中共對台工作組織體系概論（台北：法務部調查局印行，1996年12月）。

支持與否⁷⁰。這樣將反對黨作為對台政策變數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王所指的「在野黨」是當時主張統一、反對公投的國民黨，這意味反對黨對當時民進黨大陸政策的制衡

作用，但變數仍然是台灣政府而非反對黨。尤其是，這個指標在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奪回政權之後，已難再適用，因而改為「台灣政府」顯然更為恰當。

註⁷⁰ 王銘義，「三道防線失其二，中美防失控」，中國時報，2007年7月26日，版2。

奇怪的是，李成與邵宗海指出，目前以促統為主軸的中共對台「讓利」的政策，是在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也是在爭取台灣的民心。說明北京今後將跳躍或忽略台北執政當局，直接向台灣人民進行訴求⁷¹。然從過去中共對台政策內容看，北京「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為了進一步得以「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並在最終完成統一目標。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很難想像未來北京的對台政策，不將「台灣當局」納為主要考量因素。在兩岸政治關係因台灣獨立而緊張時，中共都沒有真正放棄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情況下，很難想台海情勢走向和緩之際，北京卻做出所謂「轉折」的決定。上述學者略過台灣政府的觀點，顯然為解釋現行政策，卻忽略中共對台政策的一致性與延續性。對此，林中斌認為台灣政府對中是否表達善意，決定北京是否延續其「爭取民心」政策；洪奇昌也認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以促統為主軸的對台的「讓利」，不但符合其「兩岸和平發展」基調，也為中共尋求「國家統一」的目標⁷²；其中，發展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和平則必須「寄希望於台灣當局」。顯示出，缺少

「台灣當局」變數，就無法對中共對台政策進行完整分析。

因此，可以說對北京決策具有決定性影響力的因素有以下四項：亦即解放軍、國際社會、台灣人民與我國政府。上述我們稱之為中共對台政策的「四個寄希望」四項變數，將構成本文論述的主要架構。

(二)變數間因果與關係

在確定中共對台戰略的四項決定性變數之後，接下來如何建立起變數間的邏輯性關係，並得以進一步探求事件的前因後果效應，對於未來研究成敗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例如前述李成、邵宗海與林中斌咸認為，北京目前對台以「爭取民心」政策為主軸⁷³。但他們並未清楚說明「爭取台灣民心」在中共對台政策的位置；同時，林中斌在中美關係觀察上也有因果關係倒本為末的問題，他認為中美關係決定中共對台政策，但實際上是台灣問題導致中美關係發生摩擦⁷⁴，而不是相反。

聯電榮譽董事長曹興誠認為自己對兩岸問題的思維，與兩岸政治學者主要的不同，在於他是「邏輯導向」，而非「政治導向」⁷⁵。對此，我們也認為缺乏變數間的邏輯性

註⁷¹ 邵宗海，「分析兩會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旺報，2010年3月16日，版8。

註⁷² 洪奇昌，「讓利與兄弟之邦」，旺報，2010年3月18日，版8。

註⁷³ 林中斌口述、記者雷盈整理，「名家觀點／三前提不變 北京會持續柔軟」，經濟日報，2010年3月6日，版8。

註⁷⁴ 有關這一點，可參閱美國前國務卿舒茨的回憶錄，George P. Shultz, *Turmoil and Triumph: My Years as Secretary of State* (New York,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p.382; 另外，也可參見「美官員赴中培訓影響深遠」，旺報，2010年5月3日，版2。

關係，是導致學者陷入「政治導向」弊病的原因。陳水扁、卜睿哲與薛邁龍的觀點，表明影響中共對台政策有四個主要變數，亦即軍事能力、國際因素（其中陳水扁的「以美壓台」將國際因素過於窄化）、台灣人民，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可以說相當完整且客觀。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在於，沒能進一步闡述前述四個因素之間的邏輯性關係，因而僅能達到說明中共對台政策的功能，卻無法對中共未來對台政策進行預測，至為可惜。王銘義的中共對台戰爭「三道防線」觀點⁷⁶，不僅提出中共對台政策的變數，也說明彼此之間的邏輯性關係，可說是補足了陳水扁與薛邁龍的不足；可惜的是，與薛邁龍一樣，王銘義以中共對台動武進行單向性的分析，卻沒有針對和平方向發展提出見解。

誠如學者顏建發所指出，兩岸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經貿結構與軍事態勢，對行為主體產生支持或限制，如能對它們有深入瞭解，自然有助於研究者對於和平意圖、謀略，以及高層互動趨向的掌握與判讀⁷⁷。中共對台政策亦不例外，綜合上述學者的意見並加以批判性的採納後，可以將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重要變數歸納下列四項指標，即解放軍的攻台能力、國際社會干預與否及干預

方式、台灣人民向背與我國政府的兩岸關係政策的統獨取向。因為，我國政府政策，牽動著中共促統或是反獨的對台政策主軸，台灣人民向背、國際是否干預影響北京和、戰決策；最後，解放軍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主權伸張的重要有形資產與無形象徵。更有甚者，共軍攻台能力的高低，將反過來形塑著國際社會干預與否及干預形式，以及台灣人民與當局的向背態度與統獨政策。不難想見，北京對台的「四個寄希望」之間存在具連動性的邏輯關係。至於大陸人民及其民族主義情緒是否對中共對台戰略的制訂與執行造成影響，作者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影響力不至於大到決定性的地步。因為「六四」事件與東歐共產國家政權的垮台，不僅讓北京日後政治改革趨於保守謹慎，也提醒黨政軍領導人人民可以載舟也能覆舟⁷⁸。民氣可用，但不可被反用。

三、研究模式、假設

戰爭與戰略是否有其規律，始終是爭執不下的議題，困擾著古今戰略思想家。同樣的，中共歷經四代領導人，長達60年的對台戰略，是否存在某種長期固定不變的規律？亦或只是人存政興、人亡政息式的階段性措施？也困擾著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政策的研

註⁷⁵ 曹興誠，「統一的程序與實質正義——兼答章念馳先生」，旺報，2010年5月19日，版12。

註⁷⁶ 王銘義，「三道防線失其二，中美防失控」，中國時報，2007年7月26日，版2。

註⁷⁷ 顏建發，「兩岸和平觀察系列—高層外交 解析和平趨向之鑰」，旺報，2010年5月17日，版12。

註⁷⁸ 參見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書局出版社，1996年3月）。

究者，儘管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生「大辯論」，但在前面論及的專家學者文獻中，不難嗅出彼此對於中共對台政策的內容與是否存在或顯或隱的規律，可說是各說各話。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提出研究模式作為研究與檢驗指標。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模式，是基於下列假設所建構：

- 一、中共決策理性。如同經濟學與政治學等研究，出於自利的理性決策的假設，是社會科學的基礎，即便是那些表面看起來不理性的行為，背後亦有其理性的動機與算計。探討中共對台戰略決策時，也是基於理性的假設作為研究的基礎。因此我們認同許信良的看法，中國大陸的領導者其實是很理性的在處理台灣問題⁷⁹。
- 二、中共對台戰略具延續性，而非斷裂性的；其主要原因在於領導人的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前一任的賦予，因此僅能作戰術性的微調，不具備戰略性的彈性。
- 三、中共對台政策具一貫性，原因也在於中

共領導人所共享的思維基礎與價值觀，此思維基礎是馬克思的辯證法中國化的結果。毛澤東⁸⁰、鄧小平⁸¹、江澤民與胡錦濤等中共四代領導核心，幾乎毫無例外地強調要堅持馬列主義，並將辯證法運用在治國與治軍策略上，對台戰略亦不例外。因此，顏建發強調，在預測兩岸走向時，對於北京政策思維的理解十分重要⁸²。

- 四、中共對台戰略的決定性變數可達精簡要求。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變數儘管繁多，但如同華爾茨的觀點，可以歸納出幾個特定的變數，如此有利於此一學科的理論建構。對此，人民軍隊、國際社會、台灣人民與政府等四個彼此具有邏輯性關係的變數，形成我們所稱之為中共「四個寄希望」的對台戰略。
- 五、位置決定戰略。華爾茨與地緣政治學者均指出，國家所處的位置決定其政策內涵。喬治·奎斯特（George H. Quester）甚至認為，國家處於有利於攻擊的環境中，就會採取攻擊行動，反之亦然⁸³。

註⁷⁹ 楊芙宜、戎撫天整理，「許信良：民進黨不是台獨黨 是公投黨」，旺報，2010年5月31日，版5。

註⁸⁰ 廖蓋隆，毛澤東思想史（台北：洪葉文化，1994年11月）；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台北：新銳出版社，1994年1月）；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2001年8月）頁33-62；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文化出版社，1999年9月）頁87-200。

註⁸¹ 成龍，海外鄧小平研究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註⁸² 顏建發，「兩岸和平觀察系列－高層外交 解析和平趨向之鑰」，旺報，2010年5月17日，版12。

註⁸³ George H. Quester著、蘭育璇譯，國際攻擊體系與防禦（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4年12月）。

誠如劉華清所指出，海峽兩岸會不會發生戰爭，取決於台灣當局⁸⁴。顯示，兩岸所處的環境走向，決定著北京對台戰略內涵以及和、戰選擇。

(二)研究模式

要理解中共對台政策的制訂與轉變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變數，我們首先必須探究中共對台戰略的目標，那就是達成兩岸政治統一。在戰略目標之下的戰術手段則可分為兩大類型，其一是和平統一，另一則是戰爭統一；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張登及認為，既然和平是一個「指標」，顯示它是一個「光譜」式的概念。在兩端分別是「和平」與「戰爭」⁸⁵。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蔡明彥認為，「兩岸和平」，不應只是雙方沒有發生衝突的「靜止狀態」，而是雙方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不以武力脅迫對方的「動態過程」⁸⁶。此一概念與俞劍鴻教授「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與「中國人打中國人（戰）」的二維辯證模式在本質上沒有不同⁸⁷；因此我們可

以將兩種相反相成的手段，作為北京對台戰略光譜的兩個具有辯證性關係的極端，其目的皆在於改變兩岸政治關係現狀。然而，和、戰決策並非一蹴可幾，戰爭往往是中共領導人最後的手段⁸⁸，因而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其中，決定中共和戰的兩個因素是國際社會與台灣人民，因此可分別插入在解放軍武力攻台與和平統一兩個極端中間，形成完整的光譜。基於上述安排，我們便能建立起影響中共對台政策主要變數之間的邏輯性關係（如圖一所示）

從研究模式架構可知，本文的主旨在於立基於過去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按照辯證法架構分析影響中共對台政策的台灣政府、台灣人民、國際社會與解放軍等4個主要因素，並以兩個層次的刻度，作為中共對台戰略促統、反獨兩個主要基軸，並按和戰程度區分為武力促統、武力反獨、和平反獨與和平促統四個範疇。其中，和平反獨與持平促統，與徐斯儉所謂「消極和平」與「積極和平」意義相同⁸⁹。再者，石齊平與何頻認為，一

註⁸⁴ 任慧文，鄧後權力交班內幕（台北：書華出版社，1997年4月）頁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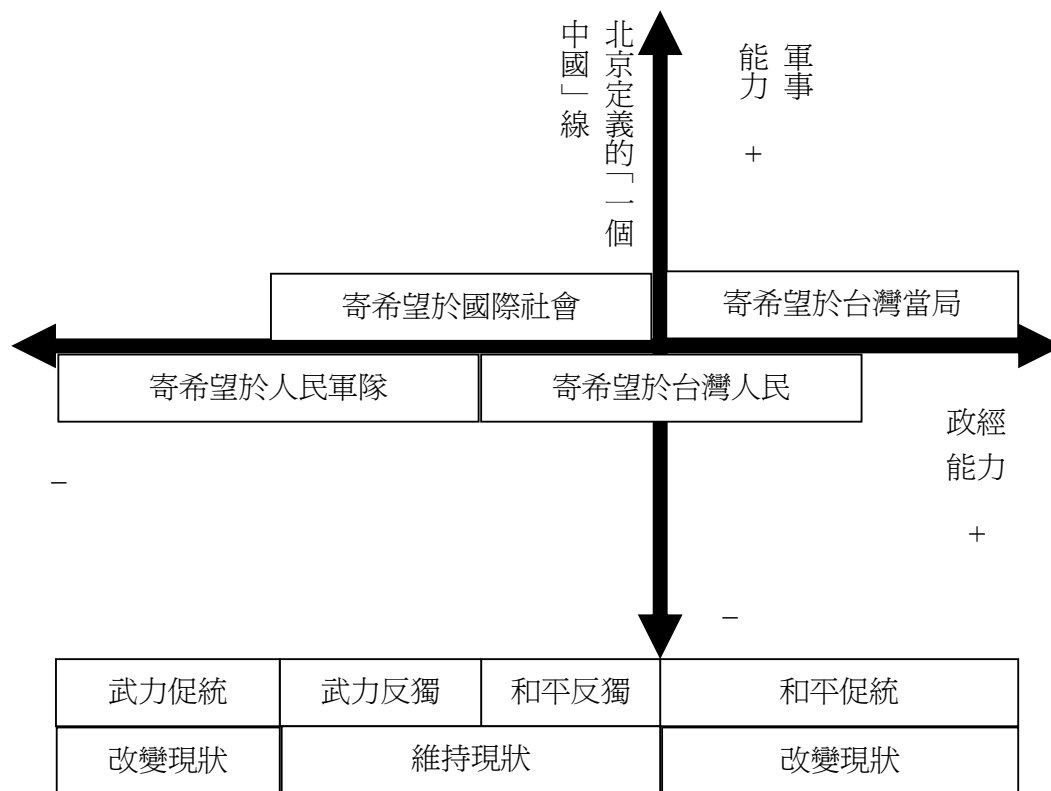
註⁸⁵ 張登及，「應著眼兩岸與全面戰爭的距離 兩岸和平觀察系列」，旺報，2010年5月19日，版12。

註⁸⁶ 蔡明彥，「兩岸和平觀察系列 和平觀察指標的建構與思考」，旺報，2010年6月15日，版12。

註⁸⁷ Peter Kien-hong Yu, "Taipei Versus Beijing: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military Dimension," in Peter Kien-hong Yu (ed.), The Chinese PLA's Perception of an Invasion of Taiwan (New York: Contemporary U.S.-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1996) pp.1-26.

註⁸⁸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21.

註⁸⁹ 徐斯儉指出，兩岸間「消極和平」，是指一種對於「戰爭」的距離狀態，是遏制不利和破壞和平之消極因素的狀態；而兩岸間的「積極和平」則是指，一種有利穩固永久和平之積極因素累積建構的狀態。徐斯儉，「兩岸和平觀察系列 兩岸處穩定和平的較低階段」，旺報，2010年5月31日，版12。



圖一 中共對台戰略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旦北京不再「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意味著將對台採用軍事行動⁹⁰。但事實上，誠如王紹光的分析，打擊台灣區分反獨與促統⁹¹，也就是武力反獨以維持現狀，以及武力促統以改變現狀兩個層次，不應混為一談。我們

認為，唯有將影響中共對台戰略四個變數按照和戰兩極光譜，進行辯證性的排列以建立彼此邏輯性連動關係，才能達客觀、全面與辯證的研究要求⁹²，不僅可以說明中共過去對台政策，解釋現狀，更重要的是能夠預測

註⁹⁰ 石齊平，新中國：廿一世紀海峽兩岸的出路（台北：工商時報，1996年4月）頁6；何頻，「台灣與大陸關係的三個階段」，收錄在高新整理，江澤民面臨的挑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7月）頁279-281。

註⁹¹ 王紹光，「如何阻止台灣獨立發生分歧」，收錄在高新整理，江澤民面臨的挑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7月）頁282-283。

註⁹² 徐尚禮、韓化宇，「陸官方客觀、全面、辨證分析兩岸形勢」，旺報，2010年3月14日，版7。

未來北京在兩岸關係方面可能採取的行動。

從上圖所示可以看到，當兩岸關係落點在「北京所定義的一個中國」線右方時，北京的對台政策便以促統為基調，力求兩岸由經濟而政治的方向邁向統一；同時，解放軍處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狀態，其主要任務在於防止國際社會的干預。一旦兩岸關係落點於線的左方，北京對台隨即調整為以「反獨」為基調，此時以經濟誘因討好台灣人民，並力求「以經促政」；另一方面，解放軍的任務在於恫嚇台灣人民與政府，並將國際社會拉進兩岸事務，以牽制台北政府持續朝獨立方向移動。一旦國際社會置之不理，或甚至支持台灣法理獨立，解放軍便會對台發動攻擊，以反方向方式讓國際牽制台灣，人民與政府妥協，並且以有利於北京方式進行政治談判。如果解放軍具備迅速擊潰國軍，並能嚇阻、防止或延緩美、日盟軍的干涉能力，中共將會傾向寄希望於解放軍，去解決和平談判所達不到的統一問題。其中，中共以戰爭與和平促統的政策，都將改變兩岸現狀；只有在反獨區塊時，北京則力求維持現狀。必須注意的是，模式的四個變數，並非依序排列關係，而是互相重疊，形成互相作用的結構。就像地緣政治學者所強調，圖中兩岸關係所處象限位置，決定中共

對台戰略的主軸與和戰比例「配方」，其中向下箭頭刻度左右移動，將牽動著北京對台戰略的常與變。

結 論

本文主要目的在於試圖從中共所依賴起家的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作為探討中共對台政治戰略的基本思維。作者們認為，誠如賈慶林強調，要「客觀、全面、辯證地把握台灣局勢和兩岸關係形勢⁹³。」從北京政權的角度觀察環境、解釋歷史，並分析其達成戰略目標的策略，避免因立場、意識型態偏見所引發的誤導困境，能客觀地對過去中共對政策歷程、現狀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同時北京領導人不改其辯證法思維情況下⁹⁴，也在相當程度上有助於以此預測未來發展的可能性，期能根據過去學者研究成果，提供一個與過去不同的研究模式，解決有關中共對台戰略的爭論與問題，俾利為未來中共對台政策理論化的目標，發揮拋磚引玉之效。

作者簡介

張蜀誠中校，海軍技術學校中校組長，樹德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註⁹³ 林琮盛，「賈慶林：鼓勵台灣人兩岸交流」，聯合報，2010年1月30日，版2。

註⁹⁴ 杜運泉，「和諧世界：胡錦濤國際戰略思想探析」，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頁59。